

在程式化的社会里 找寻特立独行的心灵

□ 周 倩/文 李法明/书法

20年前作家王蒙曾问:“当人类变得越来越事物化,当贪欲得到了技术的支持,当争斗发展了人的智慧而智慧又发展了人类的争斗,使争斗达到毁灭自身的边缘,当生活变得越来越匆忙,匆忙得似乎忘记了生活,当浅薄、迎合、刺激的油彩差不多淹没了艺术的真容:诗能帮助我们吗?诗能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吗?”——题记

我从未认真想过诗歌会有如此的魅力,但这个夏天,随着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的队伍,我走进了不一样的诗人的世界,我也开始认真考虑,诗歌到底对这个社会有着怎样的推动?

一群爱标新立异的诗人

军人出身的王久辛,让他富有情怀的诗人气息隐藏的更深些,他说话很直,几乎一语破的,他讲:“当代大多数诗人没有修辞准备。”什么叫修辞?他用手指一个个别划着:“比喻、排比都是最基本的修辞,还有更深层的修辞,中国汉语共有 72 种修辞方法,你用了,写 500、1000 行诗让人读起来一点不觉得累,这就是修辞的作用。”

王久辛喜欢用烟嘴抽烟,说话的时候把烟拿的离人较远,他说写诗的人有三种状态,一种是自由式的,作者一般想到哪写到哪,写自己的心声,虽然缺少训练、经验,但他们的诗歌带有毛茸茸的、最初的新鲜感。他说他上中学时候的诗歌多数都是这样的形态。及至有了专业化的学习,开始对各个流派的诗歌有了研究,就进入第二种状态,专业式的,这时作者经过了正规的学习,掌握了审美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写诗也变得专业起来。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也许是怕我还不够明白,悠然从兜里掏出一根香烟,放在烟嘴上燃起来:“比如我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诗歌,首先是源于我对苦难的感触,30 万人被杀,

30 万人排队排该有多壮观?可是他们就这么沉寂地躺在那里,躺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大雾从松软或坚硬的泥层慢慢升腾/大雪从无际也无表情的苍天缓缓飘降”这是王久辛《狂雪》中的诗句,他说写下这样的诗句,是因为他把心沉浸在南京的那个冬天里,那个萧瑟、肃穆的地方。

他的眼神随着香烟的云雾微微闭起:“对苦难的理解,是需要你用心去体会的,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要有心灵化的想象力。”接着他的语言突然变得急促起来,“你再想想鬼子拿刀杀人的场景,妇女被强奸,孩子在哭泣,年老体弱者发出的默默无助的叹息……”

“这时候鬼子进城了/铅弹/像大雨一样从天而降/大开杀戒的城门/杀得痛快得像抒情一般……”王久辛说他的诗里面充满了对那个时候的南京人,更是对中国人的悲惨的震憾,因此他的诗歌《狂雪》也是这样完成的,是用心、用血泪完成的。

思绪回来,他沉默半分钟,接着说:“当你 对世界诗歌文学有所了解,对中国古代诗歌有所了解,当你既有沉静心灵的能力,又对世界先进文化有所准备的时刻,再加上诗人本身充沛的情感,这时就达到了第三种状态,有哲学思考的专业诗人。”

在王久辛眼里,诗人就是一群爱标新立异的人,他开玩笑说:“你看,来的这些诗人,互相谁都不理谁,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不同于别人,但我们人类正在趋向同质化,一样的建筑、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城市。”他变得严肃起来:“同质化的蔓延很可怕,因为它会让人失去思考的能力,停止人的思想,谁都知道克隆最简单嘛。”他把香烟掐灭,镇定地说:“我们说的所有的创新,归根结底就是人的创新、思想的创新,诗人的作用就在于此。”

听杨牧讲《我是青年》

已是古稀之年的杨牧,头发早已斑白,脸上的老年斑也足以让我心生尊敬。第一次跟一位

年龄可以称得上爷爷的人面对面聊青年话题,让我诚惶诚恐。上世纪 80 年代,杨牧的一首《我是青年》曾在那一代人的心里激起澎湃浪花。

“人们还叫我青年……/哈……我是青年!/我年轻啊,我的上帝!”时至今日,听杨牧自己朗诵一段,还能在我的心里激发共鸣。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杨牧参加第一届青春笔会,一次吃饭,与人聊起上世纪 60 年代的自然灾害,同行中有一位东北的女诗人说:“1960 年,我还没出生啊。”杨牧一听,头就炸了,1958 年杨牧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可她还没出生,而现在他们竟然同坐在一个板凳上当学生——是谁偷走了杨牧 10 年的青春?

假如再减去 10 年,杨牧正是青年,就不会有这样的尴尬,带着这样的委屈,不甘甚至愤怒,杨牧的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哈,我是青年! ”“我爱,我想,但不嫉妒。/我哭,我笑,但不抱怨。/我羞,我愧,但不悲叹。/我怒,我恨,但不自弃。”

我看见杨牧的眼睛里充满了亮光,几十年过去后,他已经步入老年,但当时促使他写下那样豪迈诗句的年轻人的心依然埋藏在他心底,这就是一个诗人一生不朽的诗魂吧。

如今,杨牧早已不是青年,但他的诗歌《我是青年》仍然年轻,读起来仍然可以拨动人的心弦,诗歌并没有因为时代去了而离开,至少它折射了那个时代的影子。

打工诗人的羞涩与自信

认识郑小琼,是因为我在工作中一直对打工文学有着持续的关注,发过她的诗歌,做过书面采访,这次能够在四川相遇,我本是想同她好好聊聊。无奈活动安排太紧凑,等到回京的前一天下午,我才在李白故居逮住她,上前递过名片,说明来意。郑小琼很客气,把我叫到一边,笑着说:“你看这天好热啊,这么热的天估计你也没心情采访。我也没准备好回答,你回去发我邮箱吧,我写下来寄给你。”我猜她是习惯了书面采访的形式,我的突然到

“七月流火” 与天热无关

□ 钱国宏

眼下已进入炎炎盛夏,翻阅报章,浏览网站,时见“七月流火”一词,用来形容盛夏天气之热,暑气之旺。其实,这是一种望文生义式的成语误用:“七月流火”并非不是形容天热的,而且恰恰是形容天气转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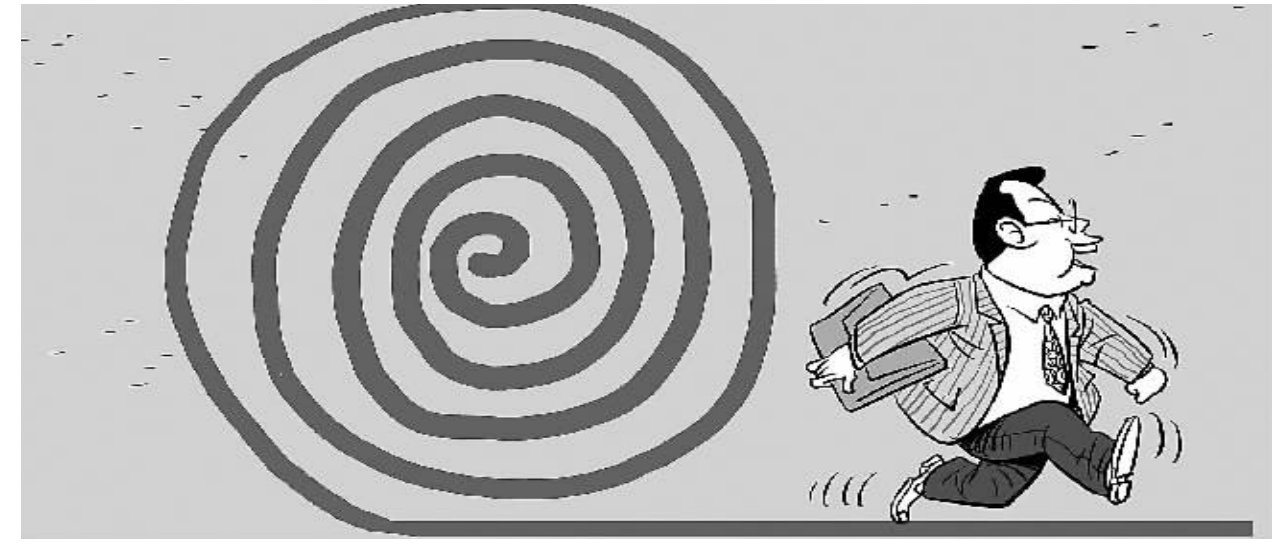
“七月流火”一词出自《诗经·邶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意思是说,“农历七月黄昏,大火星的位置由中天逐渐西移,暑热开始减退,天气开始转凉。到九月天就冷了,该准备寒衣,要多穿衣裳了。十一月北风呼呼响,十二月寒气刺骨寒,粗麻衣服没一件,怎能熬过腊月天?”可见,“七月流火”没有天热的意思。

“七月流火”中的“火”,不是指“火热”、“炎热”、“下火”,而是“毁”的通假字,发“hui”音,指的是天蝎座中的大火星。大火星简称火、火星,大火,也叫辰星、商星,天文学上称之为“心宿二”。此星高挂苍穹,逐渐西移、下坠的时候(“流”有流动、坠落之意),天气就开始转凉了。古人观察到了这一天相变化,于是就唱出了“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大火星之所以为古人所注目,是因为它在整个天穹中是最亮的一颗星,它所发出的火红色的亮光,极为耀眼。古代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大火星等日月星辰之运行变化,逐渐摸索出了天相与时令的变化规律,从而以大火星等天相变动,来确定农时,以指导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明确指出,古人对天文星相十分看重,天文知识较为普及,而且,“七月流火”一词就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是农民自己总结出来的“土语”。

大火星在东方黎明时出现的时候,时令正好是春分;大火星在西方不见的时候,时令恰好在秋分。古人对大火星的这一变化规律非常熟悉,于是,很简便设立了“火正”这一官职。《左传·襄公九年》中载,“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昭公元年》也有类似的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阍伯,叔曰实沈……迁阍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为,故辰为商星。”“火正”的主要职责就是常年观测“大火星”的位置变化,“授民以时”,以便安排农业生产。

综上所述,“七月流火”要读“七月流 hui”,它是天气转凉的一种信号,“知暑渐退秋将至”。用来形容夏季天气炎热,属于望文生义,成语误用。希望方家纠偏正听,避免以讹传讹,贻患后世。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去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重要了。 赵春青 画

萨尔图,月亮升起的地方

□ 董艳春

萨尔图,月亮升起的地方。一种宁静的、浪漫的、唯美的意境。一直想写萨尔图的月亮,惴惴的,迟迟不敢动笔。我担心以我的笔触不能很好的诠释,因而辜负了她。不动笔,题目放在心中,沉沉的,又不能坦然。

古往今来,月亮就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主题,而萨尔图的月亮,也被许许多多作家诗人泼墨讴歌,文笔隼永,尽显风采。但这轮明月在我心中,已然难以释怀。我常想,不知会有多少人将这轮明月放在心头,那也一定是千颗心有千种感受,万颗心有万种心得。而我的理解不知是一心之得,还是千心万心之和?

萨尔图,月亮升起的地方。一轮明月高挂天际,举首仰望,与之心语,一种别样的感受汩汩流淌……欲说还休不如尽情倾诉。想必千心万心都能包容,想必这轮明月也愿倾听。

萨尔图,月亮升起的地方。远古一支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在夜色朦胧中,望尽天涯不见家,那是何等的惆怅。在那无望的环境

里,在那断肠的心境下,一轮皎洁的明月缓缓升起,照亮了草原,也照亮了心。“明月何时照我还,天涯何处是我家?”萨尔图,我的草原,我的家乡。至此,流浪者不再彷徨;至此,天涯人不再漂泊。

萨尔图,月亮升起的地方。地上是肥美的草原,地下是丰盈的宝藏。新中国,石油工人一声吼,打破了草原的宁静,顷刻间,一片荒原篝火红,石油大会战在萨尔图打响,“要让那大草原,石油如喷泉”,伴随着石油工人的号子和誓言产生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并在全国迅速传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三老四严四个一样”,而令我感触最深的是“黑天和白天一个样”,铁人们战天斗地,不分昼夜,开掘挖采,奉献能源。在冬之寒夜,在荒野莽原,月亮高高悬挂,明亮了荒原、照亮了井架、映出了石油魂。萨尔图的月亮是如此富有灵性,她愿意为这块神奇的土地照亮,愿意为奋斗奉献的人们捧出亮光,石油大会战,萨尔图的月亮成为数万石油人心中的光明和由此滋生的缕缕温情。

□ 恒 敏

我的家乡在那亘古不变的黄土高坡。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我就出生在那里。虽久居都市,但我仍眷恋着那黄土地上和人事。

乡情难忘,难忘那一幅幅静谧祥和的家乡景。秋季是成熟的时节,也是收获的季节。辛勤忙碌的人们,此时此刻刻意也合不拢嘴,你看,十里堡上,极目远眺,绿油油一片,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阵阵秋风吹来,树木随风摇曳,犹如波涛翻滚的绿色海洋。走进去,硕果满枝头,红的是苹果,紫的是提子,黄的是酥梨,黄中泛红的是柿子……晨曦,一缕阳光,披着薄雾,家家户户,袅袅炊烟,鸟语花香,温馨可人,吮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令人陶醉。午后,田间人们劳动的号子声,乡亲们的嬉笑声,汇成一曲激昂奋进的“劳动交响乐”。夜晚,“素月分辉,明河共影,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着实一幅“夜来风起满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树”的图景。和乡亲们坐在

月光皎洁的农家院落,品茶纳凉,青蛙鸣,蛐蛐鸣,偶尔传来断断续续吠声,不知怎么,浓浓的乡音情结,充盈心间,难以割舍……

乡情难忘,难忘那一群群憨厚朴实的家乡人。最难以释怀的是那深厚的兄弟情。当年我小,一天,父亲外出归来,带回一个矿石收音机。那时,村里谁家有这么“玩意儿”,那可太“潮”了。哥像猴子似的攀上院内大树,把铁丝拴在树梢上,另一头拴在矿石收音机的碳棒上,把耳机线连接上,就可收听,不过音质太差。每当父亲不在时,哥就塞着耳机,像父亲般模样,眯着眼睛摇头晃脑地细听,惹人眼红;每到这时,我不由地拽着哥的衣袖,嚷着也要听,他拿下耳机在我耳边一摁,问道:“听见了吗?”我说:

访让她有些难以适应,于是合影留念。第二天回京路上,我拿出照片欣赏,依稀还能感觉到她眉宇间的羞涩,这羞涩来自于她的性格还是她的经历,不得而知。

在打工文学领域,郑小琼算是较早一批走向前台的诗人,就如杨牧对她的评价,她的诗歌不仅写得更真实、更具有生活化,在诗歌语言艺术上的造诣也是不输人的。

写诗这些年来她一直坚持关注弱势群体、平民阶层,把自己泡在生活里,用笔去代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心声。她的诗歌没有添加剂,纯天然的来自于生活,又回报给广大的读者。

郑小琼对自己曾经打工者的身份直言不讳,她说她写了很多关于农民工题材的诗歌,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打工诗人”。正如郑小琼所言:“这是一个‘马甲’横飞的年代,习惯了各种命名与被命名。因为我的身份披上的‘打工文学’的马甲,我个人也不幸地被披上了一个‘打工妹诗人’的‘马甲’。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更关心‘马甲’背后的东西。我相信,我们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去掉这个‘马甲’之后的文学,才是文学的本身。”

透过这样的话语,我能在看到她原本羞涩的内心,其实有一颗坚强、自信的心灵在支撑。

四川之行回来,我坐在办公桌前,看见 7 月 21 日工人日报家园版“人在他乡”栏目的一首小诗《搬运》:“辛勤的蚂蚁/是城市的好朋友/每天进行高强度的搬运/练出了铮铮铁骨”。我把这首小诗拿给王久辛看时,他对这首小诗大加赞赏,他说:写诗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要“真”,而这首小诗不仅“真”,还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当作者把自己比作一只蚂蚁时,他其实是在自嘲地发泄劳作辛苦的同时,也在肯定自己的劳动。王久辛说很高兴能够看到年轻人有这样的才气,有着诗人的浪漫情怀。有些些年轻后生的努力进取,我们的诗歌就有希望,人们就能通过诗歌,让自己的内心自由、灵动、高贵。

这或许就是诗歌带给人类的福祉吧。

先是足球世界杯,跟着是金砖五国峰会,南美一下子就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电视观众面前热络起来,看到巴西和阿根廷,我想到的却是一个似懂非懂的概念,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据说这个概念的基本涵义是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发展往往陷于滞胀,很难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

在前些年我国刚走上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很多大师就苦心告诫,切忌堕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三省吾心之后,智者们时常列举巴西和阿根廷来描述担忧。到今天,面对复杂的经济现状,不少焦虑的大脑仍然怀疑我们是不是正在陷阱边上转悠。

坦白说,这么专业的学问不是我可以整明白的,迷糊的感觉是,当下的发展离那个陷阱到底是近还是远,大多数人心里并没有底,尽管谁也不愿意深入到陷阱底部去调研一下,胡思乱想之余,我想到的是有些担忧何以最后成了先知先觉的理论。大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金玉良言只是对个人的劝诫了,对族群而言,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很有限,可能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吧,所以咱们总结出一个成语,就是一语成谶。

早先工业化风生水起的时候,针对一日千里的混乱速度,悲观的学者就提出千万要避开工业化污染的老路,诸如伦敦、洛杉矶毒雾事件之类的典型案例倒经常被翻腾出来,乐观的家伙则嘲笑古董异议;早有前人的探路,我们不会愚蠢如此的,而且现在科技发达,咱们使用的设备也是更新过很多代的先进产品,汽车就更不用说了,油品质量高过粗放时代太多了,遗憾的是,最后的结果证明悲观的家伙才是智者。

计划经济没了,大家各自关起门来增产增收,不小心就雾霾自己一回,权当是还可以理解的事吧,可是如机构精简这类掌控自如的事情也完全失去控制,说起来就有些不好交代。我知道的机构精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很奇怪的是,这种提高效率的事一开始就有人唱反调,说是按照帕金森定律,机构精简只会起到膨胀的效果,反调人士以帕金森定律为据推论说,除非把某些机构撤掉,否则的话精简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老大让贤自己种田,二是雇请高人协助自己,三是招募可以控制的属下为自己分担任务。分析说老大让位完全不可能,高人入府也一定会取而代之,结果三种情形就只余下一条路,那就是雇个多位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来分担各类业务,再加上配套服务的人和机构,最后的结果如何就不需要多说了,人多事情自然就更多,大家都很忙忙。智者多虑的说法再次得到明证。

相似的故事就不多演绎了,仅就一语成谶的顾虑,“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还是必须谨慎看待的。事实上以经济学家为首的师父们早就在为之贡献智慧,纷纷探寻大政方针,切磋商策,等等,高见如云,就像工业化时代一直喧嚣的声音。

然而基于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例,我对沉溺于某一方面的学说不太有信心,内心免不了会偷偷地怀疑某些以机制为纲,靠设计

□ 程应峰

以幽默著称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有抱怨的时候,但即使是抱怨,也具有不可抗拒的幽默特质。

在马克·吐温看来,他的童年是伤心的。他常常对人抱怨说:“我出生时和我的双胞胎兄弟长相一模一样,连我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有一天,保姆替我们洗澡时,其中一个不小心跌入浴缸淹死了,没有人知道淹死的究竟是哪一个。最令人伤心的是,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其实不是,活下来的是我弟弟,那个淹死的人是我。”

马克·吐温旅行演讲来到一座城市,晚饭前,他到理发店去理发。“你是外地人吗?”理发师问他。“是的,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马克·吐温回答。“你来得正是时候,今天晚上马克·吐温要来演讲,我想你一定会去。”理发师说。“是的,我想也是。”“你买了票吗?”“没有。”“票可能卖光了,你只好在那里站着了。”“还真是的!”马克·吐温抱怨道,“这个人发表演讲时,我永远只能站着。”

成名后的马克·吐温,收到许多附有照片的来信,说自己长得像马克·吐温。日复一日,这种来信有增无减,马克·吐温不胜其烦,开始只是抱怨,后来干脆写了封回信,印了几百份,发至各地。回信内容如下:“先生,我衷衷地感谢您的来信及照片,正如您所希望的,我认为,閣下的尊容,比所有那些像我的人更为相似。我不得不幸地告诉您,您的耳朵,我已经远远超过我之像自己。每当我早晨刮脸找不到镜子时,便自然而然用您的照片来代替了。”

一天,有人请教他:“讲演词是长篇大论

『中等收入』 是个怎样的陷阱

□ 欧 阳

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良策。晚近的这几十年,伴随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关于环境、关于通胀的忧虑几乎就没有断过,而且一直在优化策略,但是,冥冥之中即使是极个别固执拒斥污染产业的城市,雾霾还是渗进了门缝,我们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还是不断被通胀吞噬着。有一个现象也许可以更好地解释内中的缘由:不知不觉之间,人们都觉得汽车生活更有品质,到现在,曾经的自行车王国汽车多到中小城市都变得骑车不宜,这种变化要论起来,很大程度上是观念演化的成就,悲观地说是文化滞后的恶果。我们不能强迫他者做有利于自己的事,反过来,要让理想生活蔓延只有个人的坚持显然难以实现,这是全社会的事,是一个族群的文化镜像,就说帕金森定律吧,本质上其实就是权力欲望和等级观念的直接产物,是落后文化遗留下来的痼疾,甚至和某一时期的特定制度、体制没有多大关系,而“中等收入陷阱”特征之一的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关涉的也是文化价值所体现的生活追求。

回过头来再看那些未卜先知的忧虑智者们,他们真的会相信无财富增长的精神富足吗?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太像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像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陷阱。

马克·吐温的抱怨

好呢,还是短小精悍好?”马克·吐温顿了顿,作了如下描述:“有个礼拜天,我到教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洲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 5 分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 50 元;当他接着讲了 10 分钟后,我打心里有些抱怨了,决定把捐助的数目减至 25 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将数目减到了 5 元;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哀求捐助,从我面前走过时,我从钵子里偷走了 2 元钱。”

摩门教徒与马克·吐温争论一夫多妻问题。“一夫多妻,太不好了,连上帝也反对。”马克·吐温断然说道。摩门教徒问:“你能从《圣经》中找出一句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话来吗?”“当然可以。”马克·吐温神情庄重地说,“《圣经》曰:‘一仆二主,人皆莫能也。’妻子是主人,丈夫为仆人,俩主人共用一仆人,能办得好事吗?”

偶然的机会,马克·吐温与雄辩家得彪同乘一条船。船行数日后,两人应邀参加一晚宴。席上演讲开始了,马克·吐温思维敏捷,情感充沛地讲了 20 分钟,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然后轮到得彪演讲。得彪站起来,面有难色地说:“诸位,实在抱歉,会前马克·吐温先生约我互换演讲稿,所以诸位刚才听到的是我的演讲,衷心感谢诸位认真的倾听及热情的捧场。然而不知何故,我找不到马克·吐温先生的讲稿了,因此我无法替他演讲了,请诸位原谅。”

听得彪这么一说,马克·吐温在对他的雄辩之才暗自称赞的同时,也投去了一丝略带抱怨的目光。无奈之下,他只得向听众耸了耸肩。可以说,这是马克·吐温生活中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抱怨。

歌谣中,也少不了那神奇的传说。渭北旱原,靠天吃饭。那时,全村人畜饮水只能靠村中的一个涝池收集雨水,说来也怪,一年四季涝池里的水总是满满的,村里老人讲,传说涝池有个“玉青蛙”,每当涝池水少时,天老爷就会赐雨。冬季,庄稼收割完毕,裸露出土地本色,树叶凋零,寒风习习,使人处处感到严寒的冷酷;早已小伙伴们高兴,一个个欢蹦乱跳地来到早已结冰的涝池,脚踩两块方冰,顺势滑冰,开心惬意……“玉青蛙”不知何时丧失神力,或逃之夭夭,如今的涝池干涸见底,已是常事。我猜,涝池泥沙之下,定会翻出历史的残片和遗迹,也许是锈蚀的箭镞,也许是沧桑的牛角,也许是秦汉的瓦当……

时过境迁,人到中年,每当听到那首“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脑海中海黄土高原上的沟沟坎坎和儿时的记忆,就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宛若一股温馨升腾的袅袅炊烟萦绕脑际,四溢飘香,弥久不散……

家在黄土高坡

乡情难忘,难忘那一些趣味无穷的家乡事,其中,颇耐人寻味的当属车磨面,隔三岔五,总有七里八乡的乡亲们推着几袋麦子前去水车房磨面。水车房就搭建在沟壑半山腰,从河的上游修渠改水,形成落差,顺流奔泻到水车轮上,水车在哗哗流水的助推下,周而复始地旋转并发出“吱吱呀呀”地吟唱,转动着石磨发出轰鸣,直到把粮食碾磨成白生生的细面。由于水房不时摇摆,太过吓人,小伙伴们都不敢上去,只好下河捞蝌蚪或上树掏鸟蛋,直到大人们磨完面,才揪着他们的耳朵拎回家。虽然这种古老的磨面方式早已无影无踪,但我想,那欢快的流水声,伴着水车石磨的吟唱,不正是先贤古老发明的歌谣么!